

偏见与障碍

提高阿拉伯世界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目前这一目标的实现仍面临根深蒂固的障碍

纳兹兰·法特西

自2011年许多中东和北非国家出现暴力冲突以来，女性在经济中的角色有所扩展——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但从本文我们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女性想要外出工作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而她们要创办并经营一家企业更是难上加难。女性要想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往往需要支持她们的男性亲属提供帮助。



在创办《中东商业杂志和新闻》(Middle East Business Magazine and News)前，阿玛尔·达拉梅·玛斯莉花了13年的时间做准备、打基础。这是一份采用阿拉伯语和英语编辑的双语刊物。1999年玛斯莉创办了公共关系和媒体公司欧加利特集团(Ougarit Group)，在开发必要网络的同时积累经验。2012年，当杂志运营稳定后，她开始考虑设计一项计划来克服社会对女性企业家的偏见，以确保杂志的经济回报。

“这世界上有两种女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的玛斯莉认为，“女人和顽固的女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要想成功，你必须是个顽固的人。”

但玛斯莉很快认识到，即便是顽固的女性，要想创立一家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她也基本得不到任何支持。阿拉伯社会认为男性才是家庭的供养者，极少考虑女性的理想和抱负，因此根据该国法律，玛斯莉的杂志作为一家女性所有的公司并不符合资格。她的杂志被视为一种服务，不同

于其他女性创办的生产刺绣和手工业产品的公司，所以无法获得贷款。玛斯莉不得不与丈夫共同签署贷款申请，因为丈夫拥有可以作为抵押的财产。但随后她又因为丈夫的这次参与而失去了面向女性所有企业的五年免税资格。

如今，49岁的玛斯莉雇用了5名员工，其中包括她21岁的摄像师女儿。公司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付费用户和广告商。

她说自己能创立公司的关键在于她丈夫的支持。“如果没有我丈夫，我可能不会成功。”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认为每一位阿拉伯职业女性都需要一个愿意和她分担生活负担的男性伴侣。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东和北非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21.2%，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其他地区的这一比例约为40%。然而，随着年轻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已经成长为变革的力量，即便在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传统国家，她们也在要求平等的机会。

然而，这方面的发展仍然缓慢，即便摩洛哥女权主义组织已经成功地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采取更进步的法律禁止性别歧视，但要打破过去的一贯做法依然是非常困难的。在家庭和社会中，父权制的观念仍普遍存在，许多女性即便被雇佣，也会被分配为从事低薪职位。

此外，非文化因素加剧了这一现状。例如，在拉马拉，以色列封锁边界，限制了人口流动。传统上雇用女性的公司（如纺织业）已经破产。2012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女性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17%。



玛斯莉说，宵禁和路障也给她带来了经济上的困扰。她表示：“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企业主，引进所需设备的成本都非常高，对企业不利。”



2010年12月下旬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民众打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就业、自由和尊严”。阿拉伯地区是全球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其中突尼斯的失业率达27%。女性在阿拉伯世界多数大学中占大多数，她们和男性一样，毕业后基本都找不到工作。

由于缺乏经济机会，2011年在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频繁发生的抗议活动中，女性站在了最前线。来自教师和公务员家庭的丽娜·本-莫尼尼就是其中一员。

她说：“谈到就业，我考虑的一直都是女性和男性的就业，以及两性的自由和尊严。”

身处革命的爆发地，身为自由翻译者的她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政府倒台后，本-莫尼尼在突尼斯大学找到一份教授语言学的工作，同时她继续写博客，大胆直抒

胸臆。虽然该国于1956年起实施进步法律，但女性仍然被边缘化，本-莫尼尼对此非常愤慨。

“在女性权利方面，突尼斯被视为是最进步的国家之一。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她说道，“决策岗位上的女性很少，工资不平等，因为女性怀孕等问题，雇主更愿意招聘男性。”

在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场所，男人们每天都对女性的外表或衣着品头论足。但是随着革命的爆发和突尼斯伊斯兰组织的兴起，本-莫尼尼和与她志同道合的女性开始面临一种新的骚扰。宗教保守主义的普遍风气使男性对新式自由感到怀疑，比如女性在公共领域担任更积极的角色，以及她们对传统的质疑。本-莫尼尼受到严重的侮辱和威胁，她担心自己会有生命危险。

她说：“极端分子接受不了一个女人会挑衅他们的观点，会批评他们。”

2015年，本-莫尼尼失业了。现年34岁的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作为一名自由翻译者，她的工作既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职业安全感。本-莫尼尼是女性所面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缩影。自从“革命”爆发并承诺为女性提供机会以来，突

如果有更多的女性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阿拉伯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21.2%。这个比例一直稳步上升，但在阿拉伯国家（国际劳工组织将阿拉伯国家定义为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以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及叙利亚），男性劳动力参与率达76.4%。要缩小两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消除这种性别歧视很重要？在一个严重缺乏新的增长来源的环境中，增加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可能是促进中东和北非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2014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到2025年实现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降低25%。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如果要在所有国家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全球就业人数将需要实现5.3%的增长。

这样的结果将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到2025年全球GDP将增长3.9%，即5.8万亿美元。性别差距最大的地区——北非、阿拉伯国家和南亚——将会成为受益

最大的地区。依据IMF于2013年11月发布的《区域经济发展展望》，如果在该报告发布前十年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增长到足以将性别差距从相当于同时期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缩小到两倍，那么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可能取得1万亿美元的累计收入。

允许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积极的影响，比如提高女性福利，为她们提供更多的发挥其影响力、实现其生活目标的机会。

我们有数据支持这些有益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无论其当前的就业状况如何，70%的女性更愿意从事有偿工作。但全球一半以上的女性脱离了劳动力大军，这表明严重的质疑和反对限制了她们参与劳动的能力和自由。

本专栏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出版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17年女性就业趋势》。

尼斯的女性失业率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40%，几乎是男性失业率的两倍。

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迫于女权组织的压力，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2011年修订了宪法以保证性别平等。经济陷入困境，官员们相信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举措赢得了多方称赞。

然而，六年过去了，许多传统秩序仍然没有改变。女人们抱怨说，产假和平价儿童保育等基本福利的缺乏迫使她们放弃工作。阿比尔·埃德多达就是这样。她曾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家平面设计公司担任会计师，但生下双胞胎后，她的公务员丈夫希望她留在家里。

“他绝不允许陌生人照顾我们的孩子。就算他同意，我也找不到人帮忙。像欧洲和美国那种平价的日托服务，我们这里都没有。”埃德多达说。

埃德多达今年37岁，她曾经想等双胞胎上学后就会重返工作岗位。但10年过去了，她还是个全职妈妈。

“我已经申请了几十份工作。”她说，“没有人愿意雇一个想下午早点回去接孩子的妈妈。”在摩洛哥城市地区，只有15%的女性在工作，而男性就业率达62%。埃德多达认为，除了法律改革之外，平价的保育和课余托管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可能会为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铺平道路。

直到油价下跌，沙特阿拉伯才开始将女性视为实现其经济多元化的途径。2013年，已故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允许沙特女性从事零售业和酒店服务业，同时沙特的第一批女律师也获得了执业证书。此外，沙特的女性现在还可受雇于教育和医疗部门的工作。2017年9月26日，沙特宣布将取消对女性开车的禁令，让女性在这个几乎不存在公共交通的国家中拥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然而，在沙特阿拉伯，要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并不容易。男性在法律上拥有对女性的监护权——这意味着她们的父亲、兄弟、丈夫，甚至

是15岁以上的儿子都拥有合法的家庭决策权。如果没有男性监护人的同意，女人就不能旅行、学习、结婚，甚至不能做手术。

法蒂玛·阿玛特鲁德现年30岁，尽管她这一代与其母亲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性别方面的挑战。阿玛特鲁德的父亲只读过小学，来自东部城市塞夫瓦。她花了一段时间才征得父亲的同意，允许她去位于首都利雅得的沙特国王大学读书。

她说：“我理解他作为父亲的担忧，但我希望他能信任我，让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

阿玛特鲁德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在哈费尔巴廷精神病院担任心理医生，年薪约3万美元。她租了一间靠近医院和杂货店的公寓。但她觉得离家300英里是一种“精神”负担。她每周末都花高价乘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回家。

她认为医院里的性别歧视妨碍了女性潜力的充分发挥。“管理层对女性有偏见。”她说。

“他们给男性赋予更多的职权。女性最终只能做些非常基础的工作，这类工作导致我们无法施展技术才能，因此无法升职。”她的经理休假时总是会指定一位男同事代理其工作。

沙特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女性劳动参与率从现在的22%提高到28%。大多数拥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女性都来自富裕家庭。阿玛特鲁德为她的职业前景忧心忡忡。她目前单身，但她知道自己一旦结婚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她将有新的男性监护人，而且生育后她还要面对不利于家庭生活的就业政策。

尽管如此，未来还是充满希望——比如驾驶禁令的解除，以及今年6月放宽的部分监护权法规。改变正在发生，但是这种改变是否能及时到来，为阿玛特鲁德带来实际利益，目前还有待观察。FD

纳兹兰·法特西 (NAZILA FATHI) 是前《纽约时报》记者，也是《The Lonely War: One Woman's Account of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Iran》一书的作者。